

| 第 1 章 |

绪 论

1.1 研究问题的背景

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图 1-1 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自治区 GDP 的变化图，从中看出，2013 年西藏自治区 GDP 为 807.7 亿元，而 1978 年只有 6.65 亿元，35 年间增长了 121.45 倍；1978 年至 2013 年，西藏 GDP 年均增长率为 14.95%，远远高于同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西藏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西藏的各项事业也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局面：比如西藏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75 元升至 2012 年的 5719.38 元，后者是前者的 32.68 倍；财政收入也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由 1978 年的 4.71 亿元增长至 2012 年的 86.58 亿元；此外，西藏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重要成就，2012 年西藏等级公路里程达到 4.18 万公里，尤其青藏铁路的顺利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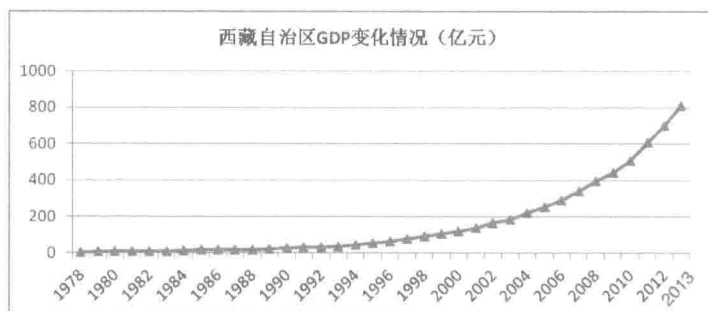


图 1-1 西藏自治区经济增长情况 (1978—2013)

资料来源：历年《西藏统计年鉴》。

在西藏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西藏金融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突出表现之一是西藏的存贷款余额快速地增长。由图 1-2 得出，1978 年西藏存款为 7.06 亿元，贷款为 1.61 亿元，二者之和为 8.67 亿元；2012 年存款增至 2050.58 亿元，贷款上升至 663.76 亿元，存贷款之和为 2714.34 亿元。2012 年的存贷款之和是 1978 年的 313.07 倍。由此可见，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西藏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时间内，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存贷款余额的快速增长，满足了各行各业的融资需求，有力地支持了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团结，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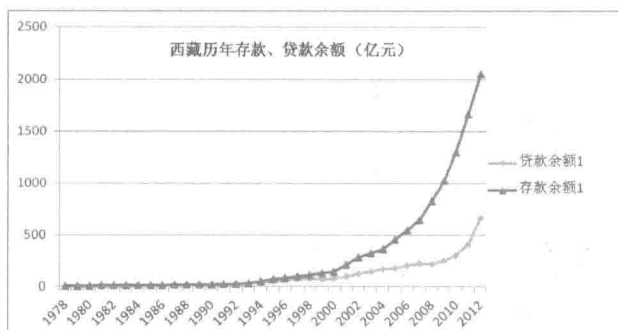


图 1-2 西藏存贷款余额变化图 (1978—2012)

资料来源：历年《西藏统计年鉴》。

西藏金融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另一个体现是：西藏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功能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截至2013年底，在藏的金融机构，包含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共计9家（该数据仅包含各银行在西藏设立的分行级别），总资产近3000亿元，从业人数达到7894人。西藏还拥有1家自身的城市商业银行——西藏银行，1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林芝民生村镇银行，如表1-1所示。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在西藏开设分支机构，形成了搭配合理、功能齐全的金融服务格局，为经济社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业人员的不断攀升，源源不断地为西藏培养了一大批精通金融实务的金融人才，奠定了西藏金融发展的基础；此外，注册地在西藏的上市公司包括西藏珠峰、西藏药业、西藏旅游、西藏发展共计11家，通过这些上市公司的筹融资活动，带动了西藏金融业的繁荣发展。

表1-1 2013年西藏自治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1]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机构个数(个)	从业人数(人)	资产总额(亿元)	
1. 大型商业银行	597	6963	2295.06	0
2. 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	2	77	60.27	0
3. 股份制商业银行	1	88	14.69	0
4. 城市商业银行	1	178	164.62	1
5. 城市信用社	0	0	0	0
6. 主要农村金融机构	0	0	0	0
7. 财务公司	0	0	0	0
8. 信托公司	0	0	0	0
9. 邮政储蓄	75	558	122	0
10. 外资银行	0	0	0	0
11.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1	30	0	1
12. 其他	0	0	0	0
总计	677	7894	2656.7	2

注：数据来源于西藏银监局。

[1] 注：营业网点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大型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其他”包含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然而，在看到西藏金融业快速发展的现状之外，我们仍不能忽视的社会现实是：无论是与全国金融发展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相比，西藏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金融机构数目较少、从业人员较少，而且还体现在存贷款额度上：比如 2012 年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存贷款余额之和分别为 24896.92 亿元、20244.89 亿元、6834.9928 亿元、27797.44 亿元，而西藏自治区仅为 2714.34 亿元，上述四个自治区的存贷款之和分别是西藏自治区的 9.17 倍、7.46 倍、2.52 倍、10.24 倍。由此可见，西藏金融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西藏金融业未来发展任重道远。

综上，作为人类史上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典型，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西藏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金融业快速发展的现状引起了人们的深思：西藏金融业迅猛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果如何呢？比如从宏观层面来讲，西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西藏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又如何呢？从微观层面来讲，西藏金融业发展对企业绩效影响如何呢？西藏未来金融发展的道路特征有哪些呢？显然，上述问题十分重要，对这些问题开展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研究问题的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也不断拉大，在此整体社会背景下，西藏自治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中央政府历来对藏区发展高度重视，先后召开五次中央级别的西藏工作会议，采取了多项扶持政策，不断促进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西藏从一个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农奴社会跨越式地向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迈

进,不断朝着小康社会目标前进,在此改革进程中,西藏的金融发展尤其引人注目,深入研究西藏金融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深入考察西藏金融发展问题能够使我们思考西藏金融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各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跨越式发展,这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各民族共同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这期间西藏金融业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然而,深入思考西藏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金融市场基础还相对薄弱、体系不完善、布局不合理、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现实紧迫性较强。本书将就西藏金融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多角度分析,来总结西藏金融发展取得的成就、不足之处等,这对于认清目前西藏金融发展的相对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本书的相关探讨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目前,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已日渐成熟,且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份的经济金融发展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特别是西藏自治区在地理、文化等方面与其他省份的差异,使其经济、金融发展现状和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结合西藏地域特征深入考察金融发展的绩效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第三,为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企业绩效等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证据。以西藏这一少数民族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VAR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研究范式,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结论,这为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分配等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样本。

第四,本书的相关研究为制定西藏未来金融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本书的相关实证考察,能够较为客观地检验中央政府对西藏金融扶持政策的效果。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本书紧紧围绕西藏金融发展现状,从多个

视角考察了金融发展的绩效，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促进西藏金融发展，提出了发展具有西藏特点的金融发展模式，为早日实现西藏自治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策参考。

1.3 本书使用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方法

西藏金融发展问题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研究内容，为了确保本书研究目标的实现，本书拟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相关的研究。一方面，采用相关的理论研究方法就金融发展相关理论进行考察；另一方面，采用VAR、面板数据模型等先进的计量研究范式就西藏金融发展的绩效展开深入的研究。

1.3.1 本书的理论研究方法

金融发展在现代经济理论体系中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其展开相关的理论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书拟采用如下研究范式展开相关研究。

一是理论分析及文献综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深入阅读国内外大量有关金融发展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关于我国金融发展，尤其是区域金融发展的理论观点，剖析现有文献研究成果及存在不足之处，从而提出本书对现有文献的贡献。具体来讲，本书主要从理论文献视角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这为本书实证部分的展开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归纳总结和对比分析相结合的理论分析方法。在归纳总结现有研究金融发展最具代表性的主要理论观点基础上，与本书的研究发现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得出本书的学术贡献。

1.3.2 本书的实证研究方法

在阐述西藏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在本书的实证部分,笔者紧密结合西藏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综合采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开展实证研究,深入探讨西藏金融发展的绩效等问题。

一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时间序列中的VAR(向量自回归)分析模型。由于考察对象为西藏地区,首先从时间脉络上归纳总结西藏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等现状,在此基础上,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的VAR(向量自回归)中的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模型等方法开展研究,进而得出实证结论。

二是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在实证研究西藏金融发展对企业绩效作用效果时,本书以西藏1998年至2007年间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这样可以较好地保证实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和客观性。

三是现代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在本书描述西藏金融发展现状这一章节,本书采用现代统计学的描述分析、对比分析等多种方法,就西藏金融发展的绝对水平、相对水平等开展深入的对比研究,以此来客观地评价西藏金融发展的现实水平。

1.3.3 本书的实证研究工具及数据

在本书的实证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使用STATA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其中西藏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等相关宏观数据来自历年的《西藏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各类统计年鉴;为了验证本书结论的稳健性,这里还采用另外一个标准来度量金融发展,即采用西藏市场化进程数据库中的若干数据,该数据来源是樊纲、王小鲁等人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

1.4 本书的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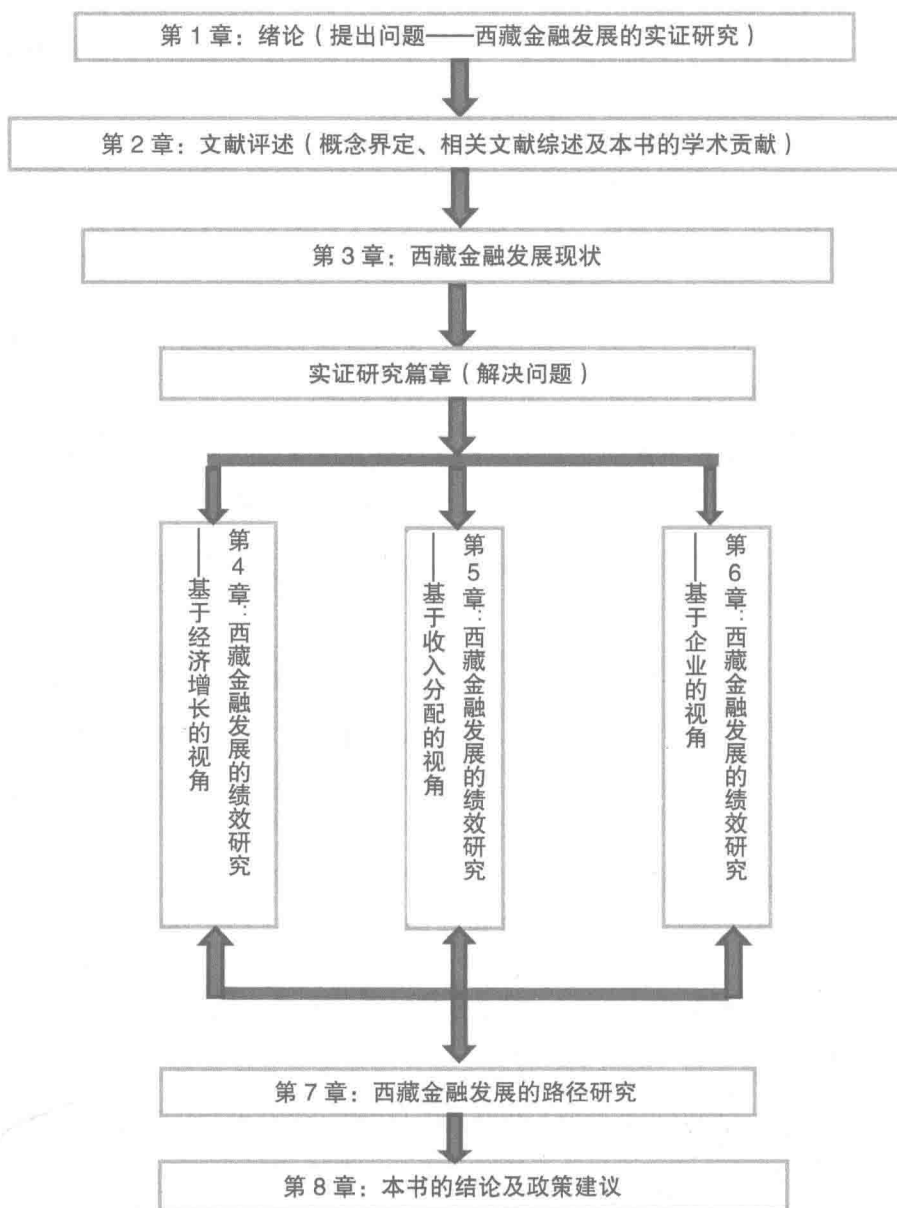


图 1-3 本书的逻辑框架图

本书首先结合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深度剖析了西藏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而采用多种研究手段,深入考察了西藏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差距、企业绩效等的作用效果,在此基础上,得出西藏金融未来发展路径。具体来讲,本书的逻辑结构如图 1-3。

第一章为绪论。提出问题:西藏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紧扣改革开放以来西藏金融发展的历程、取得的成就及不足,在此基础上,从多个视角提出研究主题,进而提出本书的创新点及研究意义等。

第二章为文献评述。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企业绩效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国外、国内两个方面总结现有文献的成果,进而提出本书的主要学术贡献。

第三章为西藏金融发展现状研究。在这一章节内,通过横向、纵向等两个视角进行多角度的统计描述,可以得出:从时间脉络上来看,西藏金融发展迅猛,目前西藏金融发展水平较之前相比,提高了很多;从与我国其他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相比,西藏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

第四章是西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在前面几章铺垫的基础上,本书的第四章至第六章为本书的主要实证章节,在这三章内,笔者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宏观视角,企业绩效微观视角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在第四章,笔者采用时间序列的 VAR 分析模型,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西藏金融发展与西藏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长期来看,西藏金融发展与西藏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论显示,西藏金融发展单向地促进了西藏经济增长,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等检验结果也证实了西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西藏金融发展与西藏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稳健性。

第五章是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来考察西藏金融发展的绩效。通过对西藏相关数据的实证考察,本书得出,在西藏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

背景下,西藏金融发展并未能够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反而金融发展显著地加大了西藏城乡收入差距。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且金融发展单向地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方差分解分析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较为显著。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单向的正相关关系,这就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第六章是从微观企业视角来考察西藏金融发展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通过采用固定面板数据模型发现:首先,整体而言,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且这种促进结果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通过分行业、所有权属性进行的分类估计,估计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提升企业绩效的积极效果随企业所属行业不同、所有权属性不同而存在着差异性。

第七章是西藏金融发展的路径研究。本章研究了西藏未来金融发展道路应遵循如下几个原则:一是从国家大局出发,二是从西藏实际出发,三是政府主导,四是内外结合、注重内因,五是抓住稳定和发展这两件大事,六是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此外,西藏金融未来发展应该从其宏观政策、机构、机制、监管及互联网金融等五个方面来构建,尤其是应该重点关注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型的融资模式带来的发展机遇和风险。

第八章是本书的结论。基于前面章节的结论基础上,第八章提出了各个章节结论的相应的政策含义,并提出本书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建议。

1.5 本书的创新以及未来的研究建议

1.5.1 本书的创新点

本书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书选题、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本书选择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

之一的西藏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金融发展取得的成就、不足及未来发展路径。本书的相关研究对于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维护各民族共同团结、边疆稳定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本书研究视角较为新颖。与国内研究金融发展的思路不同之处在于,本书既从宏观层面——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也从微观层面——企业绩效这两个视角,多角度、多层面地考察了西藏金融发展问题,得出了十分重要的结论。

其次,本书的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经济发展,金融是核心,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讲,金融发展是盘活经济的重要手段,本书得出了西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企业绩效等之间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西藏金融未来发展的路径,本书的相关结论不仅可以检验中央政府对西藏金融扶持政策的效果,而且能够为中央政府制定西藏未来金融发展战略提供重要参考。

第三,本书数据较为新颖。本书在度量金融发展这一核心变量时,除了采用传统的金融机构存贷款等指标之外,还基于一项度量中国各省份市场化、金融业竞争等较为全面客观的数据,从中采用另一个较为准确的度量金融发展的指标,进而笔者重新审视了西藏金融发展的相对水平。这使得本书的研究结论更具有客观性。

1.5.2 本书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建议

本书基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考察了西藏金融业发展问题,也得出了十分重要的结论,然而本书还存在着如下三个研究局限。

其一,尽管本书基于西藏宏观的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及微观的企业绩效等视角探讨了西藏金融发展,也提出了西藏金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及未来的发展路径，然而，该研究范畴较大，仍需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而且对西藏特殊性的研究有待深入和加强。

其二，个别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特别是企业样本数据库仅仅统计至 2007，观测样本较小。小样本难以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其三，西藏农牧区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又存在面积范围广大、人口密度较小和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特殊性，农牧民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因此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特点，本书限于人力物力等诸多因素，很难获取第一手的详尽资料，因此对于农牧区的金融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针对本书研究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重开展：

一是在进一步阅读文献基础上，结合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深入理解西藏金融业发展的现状，不断总结西藏金融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断凝练主题，深化本书中的相关研究。

二是进一步搜集西藏最新的各类企业绩效、登记注册类型、规模等相关数据，对本书中的面板数据模型重新进行估计，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同时还可以考虑在数据不够充分甚至不可得的情况下，进行一些相关的案例补充。

三是通过走访、问卷和实地调研等多种手段和方法，进一步深入了解西藏农牧区金融方面的供给、需求、制度和环境等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农牧区金融发展进行理论和实践等多角度的研究探讨。

| 第 2 章 |

文献评述

2.1 金融发展及经济增长等相关概念界定

金融发展在本书当中是一个核心概念，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此进行说明。金融发展指的是金融结构的变化（Goldsmith, 1969），可以采用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来进行度量，也即众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 FIR）。

经济增长属于经济发展理论中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较前一个时期的增长率，学者经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进行实证研究。

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在实证分析当中，一般采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这两个群体间的收入水平的比值来进行度量。

2.2 相关文献评述

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在文献当中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相对

来说比较多,本书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评述现有国内外文献:一是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视角,二是从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的视角,三是从金融发展与企业绩效的视角来进行分类研究。

2.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文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较为关注,这是因为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都十分重大。

据可查研究文献,最早研究二者之间关系的文献起步于熊彼特(1912),他的研究文献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中各类金融中介对促进现代社会的技术创新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后的文献,无论是理论性还是实证性的文献研究,基本上研究的重点都是通过研究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二者因果关系的方向、二者相互传导的机制和途径等来试图加深对二者之间的认识。具体来讲,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现有文献存在着如下四个方面的观点:

一是促进论:即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供给领先的观点。

这种观点着重强调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刺激一个地区经济的增长。对这种观点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发展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一个方面是通过提高基本的聚集效率,进而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率(Goldsmith, 1969),该理论后来被许多学者的实证文献进行了证实(如Bencivenga&Smith, 1991; Greenwood&Jovanovic, 1990; Thakor, 1996);第二个方面是通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来拉动地区经济(McKinnon, 1973; Shaw, 1973), King 和 Levine (1993)则通过对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剖析。他们的结论再一次地证实了金融发展带来了经

济的增长。Gregorio 和 Guidotti (1995) 通过对将近 100 个国家 1960 年至 1985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进而探索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内在联系。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二者之间虽然能够证明存在正相关,但不同的国家表现并不相同。该文章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发现了金融发展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金融发展大大提高了金融效率,而不是仅仅因为金融发展带来了投资总量的提高。Ross Levine (1997) 认为,金融中介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enhabib 和 Spiegel (2000) 认为可以预测金融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投资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Beck 等 (2000)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了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者属于正相关。Ce'sarCaldero'n 和 LinLiu (2003) 通过实证分析 109 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 1960 年至 1994 年的数据,证实了金融发展是因,经济增长是果,正是因为金融的发展才带动了经济的增长。Dimitris K. Christopoulos 和 Efthymios G. Tsionas (2004) 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利用采集到的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的结论。M. Kabir Hassana、Benito Sanchezb 和 Jung-SukYu (2010) 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的作用,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良好的金融制度不一定能带来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经济的稳定增长则可以创造出健全的金融制度。

然而,以 Goldsmith (1969)、McKinnon (1973) 和 Shaw (1973) 和他们的追随者 (Kapur, 1976; Galbis, 1977; Fry, 1978; Mathieson, 1980) 为代表的金融抑制主义的理论认为,国家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对金融发展是不利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的作用,进而不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以 Greenwood&Jovanovic (1990)、Bencivenga&Smith (1991)、King&Levine (1993) 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金融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经济平稳状态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而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过多干

预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国内的相关研究有: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谈儒勇(1999)认为,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我国金融中介体系的发展必须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适应,不能过分超前也不能太过滞后。他还发现,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并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但是这种影响关系并不是十分明显。对于我国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存在的内在联系,作者还认为我国金融中介与股票市场的发展要相适应。

米建国和李建伟(2002)则着重研究了我国金融抑制以及金融深化这一热点问题,结果表明,只有适度的金融发展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过度或者不足都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赵振全(2004)分析了我国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2年第四季度的统计数据,结果发现,我国信贷市场能够显著带来经济的增长,然而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这是因为,信贷市场发展带来的国内信贷总量的大幅增加对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直观有效的刺激,然而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存在的融资利用效率低下、资源逆配置的问题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康继军(2005)对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金融中介发展、股市发展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进行了比对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国家是因为它们在这三方面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相似性。他用银行的变量作为测度间接金融发展的替代变量,以股市的变量作为测度直接金融的发展的替代变量,结果表明,中国、日本、韩国的金融发展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但三国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日本金融中介的发展和股市发展对推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与股市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韩国金融中介的发展,同时国

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也对股市而言是利好消息；对于我国而言，从长远角度分析，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金融中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股市的发展，而另一方面，金融中介的发展和股市发展又反过来能促进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短期，这种关系没有得到证实，然而其论证了长期的均衡状态。

冉光和（2006）利用计量模型，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运用各种计量分析方法，分别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重点研究我国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前存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关系在东西部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是因，经济增长是果，二者之间具有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二者之间则存在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

武志（2010）通过查阅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数据，采用戈氏指标作为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探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的内在的质的提高却只能由经济增长所引致。

杨龙和胡晓珍（2011）则增加了对金融体系效率的度量，利用计量数据模型，利用我国29个省份1995—2008年14年间的数据重点研究金融发展、金融体系效率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金融体系效率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次之，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体系效率呈近似倒“U”型关系；从结果来看，我国金融发展规模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增长，但这种促进作用在区域层面上具有“门槛效应”：相对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金融体系效率都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其中，东部地区金融体系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

王书华和杨有振（2011）在OLG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两阶段规模报酬